

國際文藝研究

戰敗？凱歌？少女以什麼理由來記憶？

戰後美國對日本的“寬待佔領”及其真相

劉芳* 曾甜甜 段雯瑾

摘要：今年是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80 周年，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現在和未來。日本史學界有觀點認為，美國的對日佔領是歷史上罕見的“寬待佔領”。但是通過閱讀日本戰後史會發現，1945-1952 年進駐軍進駐期間美國的對日本佔領暴力屢見不鮮。日本當代女性作家乃南亞沙 2015 年刊行的小說《星期三的凱歌》曾獲日本第 66 屆藝術選獎文部科學大臣獎。講述了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戰敗後 14 歲的少女二宮鈴子跟隨母親輾轉各地為進駐軍慰安所做翻譯時的所見所聞，意在揭示當時女性的創傷遭遇和進駐軍佔領暴力的真相。鈴子“冷眼”凝視戰後日本女性突如其來的孤絕、淒慘的“戰爭”遭遇並使之浮出歷史地表。尤其是，鈴子與母親之間產生的精神罅隙折射出戰後日本人對待戰爭與創傷的複雜態度和記憶方式。鈴子對自己的誠實追問，引領讀者將國家與人權、戰爭與和平問題推向更深層次的思考場域。

關鍵詞：GHQ；戰爭記憶；創傷敘事；身份認同；佔領暴力

Abstract: This year marks the 80th anniversary of the victory of the Anti-Fascist War. Looking back on history is the way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There has been a view in Japanese historical circles that the US occupation of Japan was a rare "lenient occupation" in history. However, after reading Japan's post-war history, the reader will find that the violence by occupying forces at that time was rather common. *Wednesday's Triumph* written by Nonami Asa, a renowned contemporary Japanese female writer, won Japan's 66th Minister of Education, Culture, Sport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 for Fine Arts. The book is about what was seen and heard by 14-year-old girl Ninomiya Suzuko who traveled with her mother, an interpreter for the 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 (RAA), to various places after Japan's defeat on August 15, 1945, aiming to reveal the truth of the violence by occupying forces. Suzuko coldly gazed at the sudden and tragic "war" experiences of postwar Japanese women, bringing them to the surface of history. Particularly, the spiritual rift between Suzuko and her mother reflects the complex postwar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war and trauma as well as their modes of collective remembrance. Through Suzuko's sincere self-interrogation, the narrative guides readers into a deeper contemplative space regarding critical questions of nationhood and human rights as well as war and peace.

Keywords: GHQ; War memory; Trauma narrative; Identity; Violence by occupying forces

本文是遼寧省社會科學規劃基金一般項目“基於大型語料庫對日語借詞的概念研究”（L19BYY021）的階段成果。

乃南亞沙（1960-），是日本當代著名女性作家，創作風格多元而視野開闊，作品屢屢獲得大獎。1996 年《凍僵的獠牙》獲得直木獎，2011 年《大地的盡頭》獲得中央公論文藝獎，2016 年《星期三的凱歌》則獲得藝術選獎文部科學大臣獎。乃南尤其擅長細膩的心理描寫來展現人物的內心世界。《星期三的凱歌》以少女鈴子的視角引領我們看到戰敗後日本女性經歷的另一場“戰爭”。展現二戰戰敗後以美國為中心的進駐軍（簡稱 GHQ）對日本佔領時期，日本“慰安婦”、街娼“潘潘”在內的眾多女性難以磨滅的戰爭創傷和現實困境，觸發我們思考戰爭帶給女性的無盡傷害。

小說的既有研究中，增滿圭子借助作品背景分析少女鈴子在成長過程中的感悟和困惑。認為這種狀態與樋口一葉《青梅竹馬》的女主角美登利有相似性，表明少女再也無法回到天真茫然的意識中去¹。然而，這一結論並沒有真正觸及引發鈴子成長過程中產生精神糾葛的真正原因，這裡更大的背景是二戰及日本戰敗。橋本明子在著作《漫長的戰敗》一書中指出，“戰爭記憶正是當前東亞地區的爭端與不斷升級的摩擦——後來被總稱為日本的‘歷史問題’——的根源所在²。”日本國內對戰敗的認識混亂而分裂，其原因在於“大致存在三種戰敗記憶：施害者、受害者和英雄記憶。（中略）一些人視之為奇恥大辱，一些人認為這是一場可怕的災難，還有一些人則認為這是一項令自我感到滿足的成就。戰爭的意義在日本無法趨同，原因就是人們在失敗和戰敗的意義上難以達成一致³。”政治話語、戰爭責任、戰略安全、個人情感等各方因素的角力，使得日本國內一直以來對戰敗認識難以達成一致。我們只有冷靜分析這種複雜局面的形成才能對此有更深入的理解。楊力認為，“從性別視角介入戰爭研究，可以說是全球戰爭史研究的一個不可忽視的趨勢，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切入點，便是關注戰爭史書寫中被壓抑

¹ 增滿圭子，「現代文学にあらわされた『意識』：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より」，『東洋学園大学』. 28（2020）：187-206。

² 橋本明子，李鵬程譯，《漫長的戰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9 年版，第 2 頁。

³ 橋本明子，李鵬程譯，《漫長的戰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第 2 頁。

和被排除的女性聲音，進而喚起關於女性的記憶，思索戰爭中的性別結構和性別壓迫¹。”從世界戰爭文學史研究的意義上看，如胡亞敏強調的那樣“應揭示戰爭文學如何書寫戰爭中的這些獨特情感、如何展現不同民族和國家的情感結構，從而豐富對戰爭和人類的理解與認知²。”而且“文學作為歷史的媒介，在敘述歷史斷裂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運用文學想像彌補這種斷裂³。”本文聚焦少女鈴子戰後目擊特殊慰安設施中女性的種種遭遇以及由此帶來的少女成長過程中的內心糾葛，結合 1945-1952 年美國對日本佔領期間的史料進行分析文本，追溯造成女性創傷的歷史和社會根源，進而揭示美國對日佔領時期佔領暴力的真相及其深遠影響。

一、由“合法”慰安婦到慘遭拋棄的“違法”潘潘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投降。不久後，日本政府為防止進駐軍對日本婦女的侵犯和性暴力，以東京為中心成立面向進駐軍的慰安組織——特殊慰安設施協會（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簡稱 RAA），召集“新日本女性”，建立女子挺身隊，構築日本女性的“防波堤”。關於慰安婦制度的歷史背景，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就為防止軍人對平民婦女進行侵犯，以及私下與妓女接觸而感染性病，將“慰安婦”制度作為規避手段。戰敗後，他們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在戰爭期間對其他國家婦女的犯下的暴行極大可能會在自己國家身上重現。因此在宣佈投降後僅僅三天，日本政府便向各地下發關於設立慰安設施的文件，投降後十天左右迅速地成立 RAA 進行應對。以大森海岸的第一所慰安所“小町園”為首，RAA 先後設立慰安部、特殊設施部、酒館部等共 25 處慰安設施。

原本日本在二戰即將結束時，政府出臺全國性的奢侈管理政策⁴，其中明確要求加強對非法性交易的控制，同時鼓勵有執照的妓院老闆和妓女改換職業。然而諷刺的是，投降三天后，員警們又被下達為進駐軍提供足夠“慰安婦”的命令⁵。

¹ 楊力，〈日本二戰史研究的性別轉向：口述證言、記憶研究與歷史學的革新〉，《史學集刊》.3（2022）：17。

² 胡亞敏，〈世界戰爭文學史研究中的四個關係〉，《外語導刊》.1（2024）：148-157+161。

³ 牟佳，〈沉重歷史與冷調創作——“慰安婦”題材英語文學創作論〉，《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2022）：92-96。

⁴ 「國民奢侈生活抑制方策要綱」（國民奢侈生活抑制政策綱要）：為了克服戰時特殊經濟困境，各省（日本的“省”指政府的行政機關）聯合制定的控制奢侈生活的政策。

⁵ Yuki Tanaka, Japan's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and Prostitution during WWII and the U.S. Occupation

因為既有從業女性的數量無法滿足慰安設施的需要，RAA 便在一般女性中招募“新日本女性”。

出現在全國各地的招募廣告，均以招聘“舞女”或是“女性事務員”代替“慰安婦”的字眼，並且提出“提供衣·食·住”的福利條件。在戰敗後物質匱乏的社會背景下，這樣的條件無疑是極具吸引力的。連鈴子的同學雅代也會對那些打扮時髦，主動投入美軍懷抱的日本年輕女性露出豔羨的眼神¹。

小說中對於招聘時期的總部銀座有如下描寫：

“每日到銀座 RAA 總部面試的女人絡繹不絕。當然，很多女人一聽到工作內容馬上就嚇得離開了，也有相當一部分人放棄自己選擇接受。對於空襲中失去一切無依無靠的女人來說，只要保證讓她有地方住有吃穿，似乎就能促使她選擇成為‘挺身隊員’，無奈之舉。還有一些人只是單純地想著用自己的身體為國家效力。”²

政府發佈的工作資訊內容含糊其辭，只用保障吃住等這些條件來吸引女性應聘。RAA 公開招聘的兩個月後，警方發佈警告 RAA 及其勞工仲介不要“使用誇大或虛假的資訊或故意隱瞞雇主名字來不公平地招聘女性”的相關文件，有力地表明被招募的許多人都是被欺騙或被誘騙賣淫的³。本意是為保護普通日本女性而召集特殊職業女性構築成的“防波堤”，卻因為從業人數不足而勸誘普通女性參與其中，與最初的設立目的完全背道而馳。“防波堤”與所謂的“保護婦女”的美名，不過是蹂躪女性人權來維護日本的“男性中心社會”。

鈴子無意間在母親的手袋裡發現題為《特殊慰安設施協會設立宣誓式》（「特殊慰安施設協会設立宣誓式」）的文件，上面赫然寫著：“宣誓……為了重建新日本，為守護全日本女性的純血，要堅決貫徹滅私奉公的精神……”“女性‘純血’、‘守護’這些個詞躍入鈴子眼中，尤其是‘滅私奉公’四個字最為扎眼。⁴”再往後第二頁的《設立意向書》（「設立趣意書」）、第三頁的《聲明文件》（「声明書」）和第四頁的《具體實施說明文件》（「目論見書」），都是些感

（New York: Routledge, 2002），pp135.

¹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東京：新潮社，2015 年版，第 226 頁。

²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 213 頁。

³ Yuki Tanaka, Japan's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and Prostitution during WWII and the U.S. Occupation, pp147.

⁴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 140 頁。

覺荒謬而冠冕堂皇的大話，鈴子無法準確理解上面的內容。她只是懵懂地認為，“戰敗的日本今後要舉國為進駐軍提供舒適、有趣的生活。要招待美酒佳餚，準備歡快的演劇、舞蹈，演出的服裝、化妝都要到位，還要保證居住安全，還有要給他們準備女人。藝妓、娼妓、陪酒女、女招待，還有舞蹈演員¹。”

1946年1月，因為受到美國婦女和宗教團體的反對，加之花柳病在進駐軍中蔓延得不到控制，進駐軍總部（General Headquarters，簡稱GHQ）發佈了“關於廢除日本公娼制度”的文件並要求解散 RAA。

母親告訴鈴子，在慰安所工作的女性很多都得了花柳病，治療後馬上又復發，慰安所因為這些得花柳病的女性不得不關閉。母親完全站在美國人的立場解釋道：

“慰安所裡的女性得了花柳病自然會傳染給美國士兵。必須為國戰鬥的士兵們得了那樣的病，美國政府自然會為此頭疼，在祖國的親人也一定很擔心的。美國信仰基督教的人很多，基督教是不允許和配偶以外的人有那樣關係的。來到日本這樣黃種人棲居的野蠻島國，在這樣極不衛生的地方背叛家人，而且還得了花柳病，這都是違背神的教誨的，所以是非常不好的。”²

鈴子聽到這些完全呆住，她難以理解母親怎麼會如此平淡俐落地說出貶低自己國人的話。就算母親說的是事實，可是，怎麼會把如此悲慘的事情說得那麼輕描淡寫！

3月26日 RAA 關閉後，之前依靠賣春保障生活或供養家人的“慰安婦”們突然失去經濟來源。戰敗後在政府“參與進駐軍慰安大事業”的說辭下為國家“挺身”的這些“新日本女性”們，就這樣被日本政府無情地拋棄。她們中的大部分走向街頭，成為世人口中的“潘潘”（パンパン，街娼）。雖然自此公娼停業，但默認妓女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繼續作為私娼工作，於是舞廳、“特殊餐飲店”、“特殊咖啡廳”等私娼窟在不斷增加。

對於成為“潘潘”的動機，村上勝彥的《進駐軍向け特殊慰安所 RAA》（2022）（筆者譯：進駐軍特殊慰安所 RAA）總結當時京都市的調查結果。除

¹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 143 頁。

²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 343 頁。

了占比近一半的經濟原因以外，有21.7%的人出於被進駐軍侵犯後的自暴自棄，9.1%的人因為被騙，而出於對潘潘”的憧憬或是仿效朋友入行的原因分別占 8.2% 和 11.1%¹。可見，很多女性成為“潘潘”很大程度上是源於戰後衰敗的現實情況做出的無奈之舉。只有少數女性是因為憧憬或效法他人而選擇這條路。在日本廣播協會 NHK 的名為《女たちのゼロ年 ラク町のお時》（2015）（筆者譯：女人們的零年——樂町的阿時）的紀錄片中接受採訪的“潘潘”談及從業理由時，“這裡中流家庭的人（從事“潘潘”）的很多，很多人很嚮往這個職業，有不錯的收入，還可以拿到煙和酒，以及巧克力之類的點心，還可以（和客人一起）跳舞，很開心所以不會放棄（這個工作）。”可見，這些女性確實因為“潘潘”的工作經濟上得到很大改善，尤其對年輕女孩子而言極具誘惑力，以及由此引發對待美軍的複雜態度。

對待美軍複雜態度的問題，茶園敏美的研究是通過“潘潘”的證言考察佔領時期奴役過程中女性的能動性和生存策略。“她採用‘交接區域’這一分析概念，考察在權力極度不對稱的環境中，女性為了生存和自我保全如何發揮‘弱者的生存意志’的問題。例如，被美軍強暴的女性，事後往往向美軍尋求金錢報酬，緩解自身生活困頓（中略）茶園指出歷史學者應打破‘完美受害者’的迷思，對女性在極度壓抑的環境下極力生存下去的意志表示尊重，進而將這些聲音在歷史中‘複權’，重新理解和定義她們的人生經驗²。”

在鈴子眼中，“潘潘”同樣也是複雜存在。戰敗後大部分人還食不果腹的情況下，她們卻過著“奢華”的生活，同時也是脫離日本掌控的存在，顯現的是一種出格的墮落世態。她們與進駐軍進行性交易的行為，與日本傳統的女性道德觀即“純潔的大和撫子”相背而馳。但是，鈴子又認為這些女性很勇敢，替這個國家承受屈辱。從勝子母親的店裡出來後，城市已經被夜幕籠罩，街上數量龐大的“潘潘”們超出鈴子的想像。鈴子從她們身邊逃離，奔向和母親約定的集合地。不知道為什麼，鈴子默默地向她們說“對不起”，她不想成為她們，沒辦法把自己的身體拋出去。“對不起”，這樣的爛攤子就這樣甩給她們。

直到 1952 年進駐軍對日本的佔領結束，日本恢復獨立國家的身份，隨著城

¹ 村上勝彦，『進駐軍向け特殊慰安所 RAA』，東京：筑摩書房，2022 年版，第 137 頁。

² 楊力，〈日本二戰史研究的性別轉向：口述證言、記憶研究與歷史學的革新〉，第 26 頁。

市的復興，街娼的容身之處逐漸減少。雖然為日本人為服務的街娼依然存在，但“潘潘”一詞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

二、鈴子對女性戰爭創傷的“冷眼凝視”及其現實精神困境

通過鈴子的冷眼凝視，《星期三的凱歌》揭示戰後日本女性身份認同上的迷失。鈴子通過自身的經歷和對周圍女性的觀察向讀者展現戰爭如何將女性的自我認同摧毀，以及她們在性別身份上感受到的困惑和無奈。基於鈴子的“觀察”進行分析，能夠剖析出整個社會對女性身份的期待與實際狀況，從而揭示她們在尋找自我認同過程中的艱難與苦澀。

受到家父長制的影響，日本女性的社會地位長期處於劣勢，而這種男女不平等的社會狀況在戰時尤為明顯。如小說中描述的，戰時呼籲為國家禁止燙髮的標語隨處可見，還宣導“多產報國”國策要求女性生育，男性戰敗後在延續戰時對女性傳統角色作以要求的基礎上又提出服務進駐軍這樣的要求。始終將女性禁錮在狹隘的性別角色中，成為男性和社會的附庸。

戰敗後，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女性保持“貞潔”。另一方面，作為應對進駐軍的對策，公開招募年輕女性做慰安婦以構築“女性的防波堤”。成為“新日本女性”的女性用來守護所謂大和撫子的貞潔，以避免普通女性成為“傷物”（指失貞的女性）。日本政府對於女性的要求也影響著普通民眾對女性的評價標準。鈴子得知當時社會對女性的態度是源於一次偷聽到母親和姐姐的談話。母親憤憤地懟問姐姐：“如果成為‘傷物’你打算怎麼辦？你想為了那種來歷不明的人斷送自己的一生嗎¹？”姐姐則是流著淚默默地聽著，不久後便嫁給父親介紹的人。姐姐的遭遇讓鈴子明白，社會要求女性恪守自己的純潔，一旦成為“傷物”，就會影響女性的人生大事甚至因此斷送一生的幸福。小町園的工作女性正式入住的那天，鈴子再次回憶起這場對話，源源不斷地被送進小町園的挺身隊員們令她越發感到費解：“明明女性都對成為‘傷物’避之不及，為什麼她們反而要特意選擇被‘污染’呢？²”

這種社會對女性的評價標準與進駐軍進駐後出現的現實矛盾阻礙著女性們的自我認同。通過青春期的鈴子能夠深刻感受到這種矛盾所造成的心理和精神負

¹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57頁。

²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57頁。

擔。一方面，社會希望女性成為傳統的賢妻良母式角色。另一方面，現實則是將接受“守護純潔性”教育的女性們推向自我毀滅。這種期待和現實間的齟齬使她們越發迷茫，逐漸對自己的女性身份感到無所適從。鈴子在迎來具有特殊意義的初潮時，本該是作為女孩身體開始成長而值得慶賀的事情，卻讓她感到無以言說的絕望。這種絕望來自於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卻又不得不作為女性”走下去的事實。鈴子在設想自己的未來時，腦子裡浮現的只有“慰安婦”、舞女和“潘潘”：“將來的事情誰也說不準。說不定能有個幸福的婚姻，能成為一個好媽媽呢。但是也有可能要在小町園工作。不，也有可能成為‘潘潘’。三十分鐘之內，我的身體就會被若干的外國人當成玩具，最後可能會患上花柳病，變得千瘡百孔。從而可能生下眼睛顏色不一樣的孩子¹。”可見對於當時的女性來說，這是一段十分黑暗的時間。可以說，進駐軍的性暴力以及政府、社會對女性的身份壓迫是造成女性現實困境的元兇。

鈴子“冷眼凝視”女性的種種不公遭遇和身份認同的缺失的同時，還在與母親的家庭關係中面臨巨大心理與情感挑戰。因戰爭導致的人員傷亡，與戰後的經濟困難、物質缺乏破壞了許多家庭原有的穩定性。戰爭後的心理創傷不僅影響本人，也對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產生負面影響。小說中花費大量筆墨描寫的便是鈴子和母親之間複雜的情感關係。

對於鈴子來說，進駐軍是造成自己家庭破碎的元兇。於是面對在 RAA 工作並和進駐軍關係親近的母親，鈴子感到彷徨與失落。當母親用平靜的語調講出日本國民的悲慘時，讓鈴子覺得母親站在美國人的立場若無其事地說出貶低自己國家的話。特別是後來察覺到母親在和進駐軍的一位中佐交往，讓她對母親更加失望。由於戰後需要重新恢復家庭秩序，母親從原本父親在世時的陪伴職責轉向經濟職責，於是家庭情感提供者的角色出現缺失。母親每天周旋在進駐軍身邊做英語翻譯，經濟獲得獨立並在工作中得到認可。尤其是，作為單親母親憑藉一己之力讓鈴子“每天能洗上溫泉，穿著乾淨的衣服，不用再擔心因為跳蚤咬而起疹子了。每天都能三餐飽腹，無論風雨夜裡都能蓋著暖和的被子睡覺。而且從春天開始還有學可上²。”母親由工作帶來的經濟獨立和內心滿足是鈴子難以理解的。儘管她也為母親感到自豪，但是鈴子始終認為進駐軍是侵略者，母親在與狼共舞。

¹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 276 頁。

²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 418 頁。

因此，母女倆在情感認知上的罅隙愈發深刻。等到鈴子要去寄宿女校學習的日程定下後，母女間的衝突終於在一場對話中爆發。母親希望鈴子成為堅強的、獨自一人也能夠活下去的人。“媽媽給你創造環境，小鈴只做自己喜歡的事就好。做什麼都行。總之，你要有獨自活下去的能力。不用靠男人，靠自己就能好好生活¹。”鈴子無法理解這種與過去耳濡目染的“嫁個好夫家，夫唱婦隨”價值觀截然相反的建議。母親又進一步解釋道，家人確實很重要、無可代替，但是過去在本所家裡相夫教子，媽媽的內心其實是不滿足的。鈴子感到更加不解，“這好像是說，即便爸爸和妹妹沒有死，兩位哥哥沒有被戰爭奪去生命，姐姐婚後有幸福的生活，這些都無法讓母親感到滿足。難道說，比起之前家人團聚的生活，現在這樣與中佐在一起更好²？”看著鈴子迷惑的表情，母親認真地說：“你爸留下的東西確實很多，但是媽媽上學的時候就喜歡英語，結婚後很長時間都扔下了。幸好還記得一些才找到現在的工作，這對我來說真的意義非凡³。”又表情複雜地補充道：“自己沒有的，找個男人填補就好了。”⁴又說以後會和鈴子分開之類的話，鈴子以為母親要把自己扔下，於是衝母親喊：“沒問題，不用擔心。鈴子一定會一個人好好活下去的。因為我沒有您那樣的才能，需要的時候就能逮到幫得上忙的男人，不停地換⁵。”說完也不願意聽母親的解釋，便轉身離開了。戰爭中，親人不斷地離去使鈴子極度缺乏安全感，害怕現在唯一的親人會拋棄自己。而母親對待進駐軍的態度，選擇借用男性甚至是借用進駐軍的力量生存的方式，對於尚未成人的鈴子來說都是一種“背叛”，對自己和家庭的一種“背叛”。承擔家庭本位角色的母親出現“背叛”，對鈴子則意味著“家”的“崩塌”。

鈴子冷眼凝視下展現出女性的精神苦、生活苦、身體苦以及複雜的人性，更是間接地批判戰後日本政府與進駐軍的所作所為。她通過對周圍女性的觀察，展現她們在戰後社會中的邊緣地位和所承受的剝削，以及她們在追求社會地位和經濟獨立過程中的艱難與苦澀。就她自身而言，對母親的種種“凝視”又意味著身份認同和慾望糾結的觀看方法。面對同樣失去親人、失去家的戰爭創傷，母親卻選擇“遺忘和忽略”，尤其是主動迎合進駐軍的態度讓鈴子難以接受，但實際上又發

¹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418頁。

²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418頁。

³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418頁。

⁴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419頁。

⁵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421頁。

現自己只能選擇接受，這表現的恰恰是種慾望糾結。正如拉康在後期的客體凝視理論中指出的那樣，“‘眼睛’作為觀看主體在面對客體世界的時候，有時會發現自己觀看的物件以某種方式折返了自己的目光，這種來自客體世界的折返目光即是凝視，它‘屬於事物的一邊，也就是說事物在看著我’”。¹鈴子對母親的“凝視”便是客體凝視，這真實暴露尚未成年的鈴子主體匱乏的本質，尚未形成自我身份認同。與此相對的是，母親鮮明的主體意識則表明她對自身社會身份認同的肯定，承認身份認同過程中自我與他者、個體與社會的相互作用。鈴子和母親之間的情感對立，呈現出戰後日本人對待戰爭創傷的複雜態度和記憶方式。鈴子出現的精神困境則表明，構成身份認同對應兩極的自我和社會之間出現失衡。

三、佔領暴力的真相與對現實的追問

“美國的對日佔領是歷史上罕見的寬待佔領”²，該論文「寛大な占領と講和」（寬待的佔領與和談）收錄在日美戰後歷史編輯委員會編、細穀千博監修的『日本とアメリ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五〇年』（筆者譯：日本和美國——50 年夥伴關係）一書中。該書的出版背景是紀念日美《三藩市和約》簽訂 50 周年，可見這是日本史學界較為主流的觀點。真嶋亞有的《“膚色”的憂鬱：近代日本的人種體驗》則是基於“人種”來解讀日本對膚色的自卑情結，也涉及戰敗後對美國佔領者的複雜心理。然而，為理解《星期三的凱歌》中有關敘事，閱讀歷史文獻後發現，美國的對日佔領暴力屢見不鮮。這裡所說的佔領暴力，包括佔領期的性暴力，也包括種種制度暴力。

美國歷史學家邁克爾·沙勒在『「日米關係」とは何だったのか：占領期から冷戦終結後まで』（筆者譯：“日美關係”的究竟：從佔領期到冷戰結束）中寫道：“1945 年 8 月，來到日本的美軍目睹了滿目瘡痍的城市，停擺的工廠和流離失所的難民。150 萬士兵死亡，還有 50 萬平民因空襲喪生。”³可見空襲的慘烈程度。小說序章中描寫東京遭受空襲的內容頻頻出現，讓我們感受到倖存的日本平民的

¹ 陳榕，〈凝視〉，趙一凡等編，《西方文論關鍵詞第一卷》，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7 年版，第 354-355 頁。

² 日米戰後史編集委員会，『日本とアメリカ——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の 50 年』，東京：ジャパントイムズ，2001），第 4 頁。

³ マイケル・シャラー，市川洋一訳，『「日米關係」とは何だったのか：占領期から冷戦終結後まで』，東京：草思社，2004 年版，第 17 頁。

恐懼、悲傷與痛苦。

“每當塵煙在鈴子眼前飛起時，她總覺得這是‘某人’破爛不堪的靈魂在向她尋求肉體的代替。無論是建築的碎片，還是‘某人’被燒得焦黑無法辨認的軀體，都在提醒著這裡曾經發生大火。每當看見燒焦的身體殘骸，鈴子都不禁想著，不知道是誰的父母，又或是誰的孩子，和母親一起雙手合十念叨著‘南無阿彌陀佛’，雖然死得很痛苦，但終歸是從痛苦中解放了。”¹

美國陸軍戰略研究所前所長道格拉斯·洛夫萊斯指出，“日本 1941 年做出攻擊美國的決斷毫無合理性，基本等同於自殺行為。”²空襲東京是美國對日本偷襲珍珠港的一次報復行為，試圖將東京化為灰燼。對日本首都的打擊也意在震懾日本，加速戰爭結束。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佈投降。9 月 2 日，日本投降的簽字儀式在東京灣的美國戰列艦“密蘇裡號”舉行。這是時任美國總統杜魯門親自建議的。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我毫不遲疑地建議，應當在東京灣的一艘軍艦上舉行正式的受降儀式。而這艘戰艦應當是美國的船隻‘密蘇裡號’。我認為，為了加深日本人民對於戰敗的印象，在日本首都目所能見的地方舉行這種儀式是明智的（中略）我選擇‘密蘇裡號’的原因是很明顯的。在我們的艦隊中，它是最新的也是最強有力的戰艦之一。”³

日本簽訂的受降書中明確寫道：“日本的所有官廳及軍隊投降後，要遵守聯合國最高司令官頒佈的公告、命令和指示。”就是說，受降書的本質內容是日本政府要遵從聯合國最高司令官提出的一切要求。

戰敗後的第三天，日本為服務進駐軍就馬不停蹄地開設“特殊慰安設施”，並招募大量慰安婦。日本內務省警備局長橋本 8 月 18 日向各府縣知事發出指令為進駐軍招聘提供服務的女性。當時的日本財務省官僚而後成為日本首相的池田勇人問特殊慰安設施協會副理事長野本需要多少經費。“野本回答說，要 1 億日元左右。池田回道，用 1 億日元就能守住純潔還是很便宜的。8 月 27 日大森的慰

¹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 7-8 頁。

² ジェフリー・レコード，渡辺惣樹訳，『アメリカはいかにして日本を追い詰めたか』，東京：草思社，2013 年版，第 11 頁。

³ 杜魯門，李石譯，《杜魯門回憶錄》，上海：東方出版社，2007 年版，第 421-422 頁。

安設施開業，招聘了 1360 名慰安婦。”¹

小說中記述了當時一位女孩在慰安所受辱後臥軌自殺的事。小町園正式開業的那天，鈴子洗完澡後發現有個女孩躲在自己的房間裡，看上去比自己大不了幾歲。眼睛又紅又腫，身上鮮豔的和服和頭髮都很凌亂，身體在被子裡瑟瑟發抖。發現女孩的大腿根處有血滲出後，鈴子慌張地詢問她的情況，但女孩就是什麼也不說。一時不知如何是好的鈴子找到小町園的事務員阿元和益子，益子說要單獨和那個女孩談談，鈴子被阿元帶了出去。而後鈴子詢問阿元後來的情況，“阿元也只是哭著說那個女孩一定是遭遇了非常糟糕的事情。鈴子看著阿元，不禁渾身冒冷汗：阿元是事務員，不需要與美軍進行交易就這麼悲傷，那小町園目前又是何種境地呢。”²“第二天，鈴子聽說那個女孩臥軌自殺了，成為無人祭拜的靈魂。鈴子的腦子裡浮現出無數個‘為什麼’，明明熬過漫長的戰爭活了下來，結果還是死了。”³

艱苦地熬過戰爭，結果還是死了。日本政府設置的“防波堤”根本就不是守住什麼純潔，本質上是用女性的犧牲來維護“男性中心”社會的穩定性。堂堂內務省的警備局長是日本治安領域的最高責任人，高級官僚居然帶頭執行賣春任務。孫崎亨指出，“歷史上有很多戰敗國。城鎮上也出現過為進駐軍提供服務的慰安婦。也有設立慰安設施的先例。但是警備局長甚至後來成為首相的國家高層核心人物帶頭為進駐軍設立慰安設施，除了日本還找不出其他吧。”⁴慰安設施的設立不過是冰山一角。佔領初期，美國試圖從根本上破壞日本經濟，並對日本的所有行政領域進行全面改革。目的就是要日本無條件地從屬美國，毫無自主權而言。

RAA 解散後，慰安婦們再次失去謀生的手段，大部分人只能轉去做“潘潘”。她們投向進駐軍的懷抱，即使他們是造成自己創傷的元兇之一，因為她們需要經濟來源繼續活下去。實際上，依靠進駐軍也無法改變她們面臨的多重壓迫和剝削。在“狩獵”“潘潘”時期，佔領暴力的真相愈發突顯出來。1945 年 10 月，聯合國最高司令指令 153 號《關於性病控制備忘錄》⁵中，GHQ 要求厚生省對花柳病感染者進行檢查和治療，“狩獵”是其中一種措施。由於無法明確判斷“潘潘”身份，“狩

¹ 半藤一利，『昭和史 戰後編 1945—1989』，東京：平凡社，2009 年版，第 16 頁。

²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 176—177 頁。

³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 188—189 頁。

⁴ 孫崎亨，『戰後史の正体』，大阪：創元社，2012 年版，第 41 頁。

⁵ 聯合國最高司令指令 SCAPIN，全稱 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 Index Number，指聯合國最高司令官 SCAP（Supreme Commander for the Allied Powers）給日本政府下達指令的文件。

獵”過程中所有的女性都成為管制和強制檢查的對象。GHQ 的這項舉措並不是出於對女性身體健康的考慮，不過是為了保證他們的士兵身體健康。為確保進駐軍安全性交”，日本政府也積極參與強制檢查，實際上成為美日聯合對日本女性有組織的性暴力。這種過度檢查和拘捕行為侵犯了女性的基本人權，製造性別歧視和偏見。女性不僅要忍受失業帶來的經濟困境，還要面對隨時可能遭到逮捕的威脅，以及以公共衛生為藉口的侮辱性管制和檢查。可以說，日本女性在戰敗後一直遭受著日本政府和進駐軍的雙重迫害。她們在戰後的境遇，不僅反映戰敗國的社會重建問題，更揭示出在權力結構下的性別不平等，是赤裸裸地將女性用作交易。

雖然女性們並不能夠直接認清佔領暴力的真相，但對於國家和政府的失望不斷積累，逐漸衝垮她們的民族認同感。最開始使她們感到失望與無奈的是員警的不作為。RAA 的設立依然無法阻止進駐軍的猖獗行為，受害者開始會向日本員警報警求助，一旦發現日本員警並無約束進駐軍的權力後只好放棄。因此，紀錄在冊的進駐軍罪行遠遠少於真實發生的案件數量。據藤目雪的研究，1945 年美軍佔領日本後，僅在第一個月內就實施約 3500 起性暴力。¹不久後 GHQ 開始對新聞報導實行審查，並要求日本政府對於進駐軍士兵犯罪的報告必須附有辨認犯人的證據。實際上受到威脅的緊急情況下，進駐軍又身著相同的制服，明確辨認犯人對於受害者來說十分困難。於是受害者的消極情緒加劇，有關進駐軍犯罪的新聞逐漸消失，只剩下那些讚揚美國民主精神的積極報導。這些日本女性的遭遇，就如陸薇薇指出的那樣，“與我們當前社會要求受到性侵的女性是‘完美受害人’一樣，歸根結底是男權邏輯在作祟。”²但是日本政府和員警不過是執行者，背後的真相是美國對日本實行的間接統治。一旦出現對進駐軍不利的事件就會被直接抹殺，銷聲匿跡。

國民的失望情緒還因為政府的逃避責任進一步加劇。1945 年 8 月底，首相東久邇稔彥提出“一億總懺悔”的說法。宣稱戰敗不僅是政府政策的問題，國民道德的喪失也與戰敗脫不了干係，因此要求包含軍、官在內的全體國民進行反省和懺悔。這意味著連同一無所知的孩子也要一起負起戰爭的責任。對此，小說通過

¹ 藤目ゆき，『性の歴史学』，東京：不二出版，2015 年版，第 326 頁；惠泉女学園大学平和文化研究所編，『占領と性——政策・実態・表象』，東京：インパクト出版会，2007 年版，第 14 頁。

² 陸薇薇，〈父權制、資本制、民族國家與日本女性——上野千鶴子的女性學理論建構〉，《開放時代》，7（2021）：122-137+8。

鈴子的疑問說出人們的心聲：“明明淪落到家破人亡、食不果腹境地的是自己，為什麼要謝罪，又是因為什麼事情向誰謝罪？”¹1945 年 9 月 11 日，GHQ 指控戰時日本指導者之一東條英機為 A 級戰犯之一並下達逮捕令，東條為逃避戰爭責任而選擇自殺。這種不願負責、選擇最輕鬆的解決方式的行為更加激起國民的憤怒，也讓他們認清政府與國家的不負責任。

如此背景下，小說中母親略帶諷刺地對鈴子說：

“現在回想起來，都是國家這樣安排的。一個又一個地打出新標語，讓我們像誦經一樣地歌頌著，好多年都如此。我們老百姓就這樣傻傻地相信了。按照國家說的去做，覺得一切都是為了國家，連寶貝兒子都交出去了，結果什麼回報都沒有。別說鬼魂了，連住的地方都燒成了火海。千鶴子這樣無辜的孩子們也被殺害——沒想到竟是這樣的下場。”²

鈴子知道，母親已經看透了這個國家和這個國家的男人們！這段獨白不僅是母親對國家的不滿與質疑，更是反映出戰後許多日本國民的心聲。母親和鈴子通過自身遭遇告訴我們，“面對不以人為本，而以人為本錢的暴力與不義，（中略）這一切都可為弱者的抵抗之姿。”³

日本國民經歷戰爭帶來的巨大創傷，卻在戰敗後被要求共同承擔責任，而那些真正應該負責的人只是將責任推給弱者，自己卻選擇逃避，甚至享受著繁榮舒適。這種不公和失望的情緒，成為戰後日本社會的一大痛點。不僅加深了國民對政府和國家的不信任，也引發對戰爭本身的反思和批判。孫崎亨在其著作中總結伊丹萬作在 1946 年發表的「戦争責任者の問題」（戰爭責任人問題）中的要點，“大多數人在這次戰爭中受到欺騙，但沒有一個人承認自己欺騙了國民；（戰時）全體日本人都在相互欺騙；報紙上拙劣的報導，町會、臨組、警備團、婦人會等民間組織是多麼熱心、自發地配合著欺騙。國民現在要是輕易地說出‘受騙了’，那麼今後恐怕還會不斷被騙。”⁴伊丹呼籲日本國民要深刻、清醒地反省戰爭責任問題，從而避免國民被反覆愚弄欺騙。亦如步平所說，

¹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 222 頁。

² 乃南アサ，『水曜日の凱歌』，第 414 頁。

³ 王升遠，〈弱者的抵抗〉，《讀書》.2（2024）：160-167。

⁴ 孫崎亨，『日米開戦の正体』，東京：祥伝社，2015 年版，第 36-37 頁。

“對‘一億人總懺悔’的批判，則強調日本戰爭指導者應負的戰爭責任。這種判斷雖然便於從法律層面對戰爭罪犯進行制裁，但忽略了在道義層面上對曾經全力支持戰爭的日本國民的戰爭責任的追究。日本國民反省自身的戰爭責任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日本發動 15 年對外戰爭不僅僅是國家領導人的責任，它更是一場全民總動員的國家總體戰。”¹

可見，日本需要全民意義上對戰爭責任的深刻反思，而不是單純作為受害者或是將責任推給國家層面，為日後日本戰爭責任的認識問題埋下深遠的隱患。

當時日本社會的實際情況是，日本受到美國の間接統治，政策決定權在美國。國民只能看到日本政府的行為，卻看不到美國對日本政府的命令。戰後處理實質上是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為第一原則考慮的，“美國為了順利地實施佔領政策而免除對包括天皇的戰爭責任在內的重大戰爭責任的追究。”²孫崎享犀利地指出，“戰時日本是軍人做主子的奴隸國。戰後日本則是進駐軍做主子的奴隸國。”³

但是時至今日，日本依然沒有正面解決戰後處理國際義務的現實，以及因此產生的種種不正常現象。高橋哲哉的“戰後責任”就是基於這樣背景提出的，

“承擔戰後責任可以分為政府層面和市民層面，首先是日本政府應當承擔的國際義務。正如他（筆者注：高橋哲哉）所分析的：日本如果能夠儘早地承擔起戰後責任，就不會發生對半個世紀後的一代人追究戰爭責任的問題了。而在市民層面，包括知識份子的層面和社會輿論的層面，建立‘戰後責任’意識，才能更好地抵制以‘自由主義史觀’為代表的種種‘歷史修正主義’思潮。”⁴

四、《星期三的凱歌》的當下意義

《星期三的凱歌》於2016年3月獲得第66屆日本藝術選獎文部科學大臣獎，其獲獎理由是“該作品將戰敗初期為進駐軍提供性服務而設立的慰安設施作為背景，以極為平易親切的筆觸刻畫出主要人物的心境與人生，同時又嵌入國家與人權、戰爭與和平這些深刻主題，是一部兼具社會性和文娛性的大作。以

¹ 步平，〈關於高橋哲哉先生的《戰後責任論》〉，《戰後責任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 年版，第 3 頁。

² 步平，〈關於高橋哲哉先生的《戰後責任論》〉，第 3 頁。

³ 孫崎享，『戰後史の正体』，第 53 頁。

⁴ 步平，〈關於高橋哲哉先生的《戰後責任論》〉，第 11 頁。

青春期少女的視角引領我們關注並思考上述主題。作品內容富含深刻的時代性，這是前所未有的，以日本當代史為基礎，誠實地面對頗為棘手的主題，細膩、深刻的創作姿態值得高度讚揚。”該獎項始於1950年，頒發給每年在藝術領域表現出色，富有創新性的作者，這部作品的獲獎可謂名至實歸。然而，耐人尋味的是2015-2016年還出現了可以載入“慰安婦”研究史的歷史事件，即韓國學者朴裕河的著作《帝國的慰安婦》在韓國、日本引發強烈社會反響。在《帝國的慰安婦》一書中，朴裕河打造出新的朝鮮“慰安婦”群像：她們既是受害者，又與日軍士兵保持著“同志”關係，是“帝國”統治體系中具有“愛國志向”的對日“協力者”。朴裕河的這一觀點挑戰“慰安婦”傳統歷史敘事中不容置疑的公共記憶，“全力解構朝鮮‘慰安婦’=‘純潔少女’的敘事框架，進而批判韓國國內的民族主義思潮。”¹而她所謂的還原真實的歷史又似乎過於單一化和力求標新，“朴裕河無視歷史脈絡的資料引用和解讀，顯然有損學問的嚴謹性和嚴肅性，她構築的朝鮮‘慰安婦’的新形象，與其說挖掘、還原了當時歷史的真實場景，還不如說這只是她心目中的‘真實’，是她自己思想創造的產物。”²

小說《星期三的凱歌》呈現出細膩的心理描寫和深刻的社會性，可見乃南亞沙為創作做了大量、深入的調查。在生動的“現實”場景中，鈴子一次次誠實、扣人心弦地追問和反詰引領讀者將國家與人權、戰爭與和平等問題推向更深層次的思考場域，讓我們通過文學更形象地理解歷史的複雜性與縱深感。近乎真實的創作，令讀者甚至產生這樣的疑問。“這部作品從2013年開始在《小說新潮》上連載，很好奇近年來這種描寫少女戰爭體驗的創作動機是什麼？我個人還很想知道，1960年代出生的作者的真實經歷。”那麼，作者通過作品又在訴說什麼？《星期三的凱歌》展現出戰時和戰後女性的悲慘遭遇及其心理創傷，呼籲社會關注和正視這一群體的歷史和現實困境。細膩的心理描寫，刻畫出戰後日本女性在面對身份認同、家庭破碎及社會壓迫時的種種創傷與掙扎，也充分暴露出日本社會長久以來的男性優越主意和戰後日本對美國的無原則妥協。而美國對日佔領時期的慰安婦問題，“從女性視角出發的議題之一，便是將慰安婦制度和美軍佔領日本時期的性奴役制度相關聯，探討兩者在性剝削和性

¹ 朱憶天、王寅申，〈“慰安婦”問題與東亞地區的“歷史和解”——透視朴裕河《帝國的慰安婦》一書之論爭〉，《抗日戰爭研究》，1（2020）：158。

² 朱憶天、王寅申，〈“慰安婦”問題與東亞地區的“歷史和解”——透視朴裕河《帝國的慰安婦》一書之論爭〉，164。

暴力維度上的延續性。”¹無論從何種視角出發，戰爭創傷·性暴力都是經歷二戰的亞洲女性的普遍性議題。

又如某位日本參觀者在南京留下如此感言，

“我知道這麼做很難，但當我們置身此地，我能感到中國人的悲傷和憤怒縈繞在心頭，他們經歷了如此難以名狀的暴行。一想到我是那些日本人的後代，就覺得心情壓抑。我很彷徨，但還是堅持認為，逝者是能說話的！南京的遇害者應該站起來，譴責我們日本人！因為我們在戰後沒有坦白過去的所作所為，所以也就無法在不自慚形穢的情況下構建一種嶄新的歷史觀。”²

借用這段感言似乎也能夠理解，近年來少女戰爭體驗敘事的興起。這種創作不失為一種坦白過去所作所為的“方式”，令讀者在文學中彌補歷史的缺失，反思戰爭的殘酷與複雜。

“然而需要警惕的是，雖然日本學界開始思索‘慰安婦’和‘斑斑女’³問題之間的歷史連續性，挑戰既有政治史的時間分期和研究範式，但這種做法卻給一些右翼學者可乘之機，後者試圖淡化戰爭時期‘慰安婦’制度給亞洲其他國家女性帶來的嚴重傷害。”⁴

“雖然一些日本學者聲稱採取反思的立場，指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戰爭性暴力罪行像日本那樣殘酷到極致，但在將日本‘慰安婦’、戰爭性奴隸制度與美軍佔領期性暴力、RAA 等關聯在一起的同時，將討論重點置於美軍佔領時期的性暴力事件，極力控訴美軍給日本女性帶來的傷害，這種做法難免有避重就輕、將日本塑造成戰爭受害者之嫌。”⁵

需要警惕右翼思想和日本忽略其他亞洲受害者過分強調自身是受害者的短視歷史觀。另外，也需要通過反映日本當下社會新動向的文學作品等，來關注日本社會對戰爭性暴力、戰爭責任和戰後責任等問題展現的姿態。步平認為，

¹ マイク・モラスキー，鈴木直木訳，『占領の記憶・記憶の占領——戦後沖縄・日本とアメリカ』，東京：青土社，2006 年版，第 207 頁。

² 伊恩·布魯瑪，倪韜譯，《罪孽的報應——德國和日本的戰爭記憶》，上海：三聯書店，2018 年版，第 132 頁。

³ 與‘潘潘’同義，也是音譯。

⁴ 楊力，〈日本二戰史研究的性別轉向：口述證言、記憶研究與歷史學的革新〉，26。

⁵ Yuki Tanaka, Japan's Comfort Women: Sexual Slavery and Prostitution during WWII and the U.S. Occupation, pp182.

如果長期忽略這些問題“使我們對日本國內的鬥爭局面缺乏科學的把握，從而喪失我們與日本進步勢力共同思考與共同鬥爭的有利時機。”¹

結語

1945 年 8 月 15 日是星期三，《星期三的凱歌》描寫的是戰敗還是凱歌？小說名字充滿揶揄和反諷。歷史學家嘗言：“過去深入骨髓。”我們從外部看待戰爭時，總是不由自主地將日本看作一個整體，會去質問這個國家和國民怎麼看待自己不光彩的過往？如何看待和記憶戰爭的？又如何歷史的罪孽中審視自我？通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星期三的凱歌》從日本內部以具體而鮮明的立場向我們做出了回答，儘管有些結論“很微觀”並且個人化。鈴子和母親之間的衝突複雜而深刻。

“對於經歷過日本戰敗的人們來說，不管政治立場如何，所有人都在這一點上有著共識，即無論如何都不想再一次經歷戰爭和饑餓了，一起來建設一個和平富足的國家吧。只不過，有的人更看重‘和平’，有的人更看重‘富足’。從這一點來說雙方都把對戰爭的記憶作為其思考的出發點，因此也可以說，他們是站在同一‘地基’之上的。”²

女性們成為日本政府發動戰爭的巨大犧牲品。戰時她們失去丈夫、兒子、兄弟，戰後還要獻媚於進駐軍而後遭到國家和社會的拋棄。自己“不光彩”的過往只能獨自忍受和消化……日本政府戰時、戰後都只是把女性看作可以犧牲的存在。戰敗後，日本政府又調動嶄新的、修正後的敘事來解釋慘痛的國家失敗。悼念亡者、轉嫁責任，從恥辱與罪責的重擔中試圖恢復正常。橋本指出，“這項岌岌可危的工程，正是日本戰敗文化的核心所在，是對做一個日本人意味著什麼的痛苦探究。理解這個工程，對於評價日本的選擇——民族主義、和平主義，還是‘和解主義’——以及討論日本在當下面對的國內外緊張關係，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³小說讓我們認識到，實際

¹ 步平，〈關於高橋哲哉先生的《戰後責任論》〉，第 13 頁。

² 小熊英二，歐文東譯，《平成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 年版，第 376-377 頁。

³ 橋本明子，李鵬程譯，《漫長的戰敗：日本的文化創傷、記憶與認同》，第 2 頁。

的政治安排，往往比所謂的歷史規律和民族性格，更能影響一個國家在面對自身問題時所採取的態度。“這個國家沒有設法去總結戰敗的原因，或是努力瞭解戰爭的可怕及其複雜性，也沒有吸取教訓或得出結論，更沒有進行過真正的全國性辯論。每個人都發現，緬懷死者以維持自己對戰爭的回憶，僅僅是一種個人義務。”¹從佔領暴力的真相中還會發現：二戰後直至今日，美國持續對日本產生影響。孫崎亨在其著作的跋中重申，美國總是基於自身利益對日本提出種種要求。美國的對日政策總是從自身利益出發進行考量，其政策會因為美國自身處境的改變而發生很大變化。²

這種不對等條件下形成的日美同盟限制了日本的外交格局和選擇，也為日本、東亞帶來更大的動盪和隱憂。一旦出現危機，日本國民在這種政治環境下只會被犧牲，處境複雜而無奈。

（作者單位：大連外國語大學）

Author Affiliation: Dalian University of Foreign Languages

¹ 田穀治子、西奧多·f.庫克，小小冰人等

² 孫崎亨，『戰後史の正体』，第365頁。